



文/徐耀

创新乏力的文化根源

“中国文化,注重如何运用知识,不注重追求真理。”^[1]这是一句发人深省的话,背后隐藏着对中国文化基因的深刻解读和高度总结。我看过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也看过其他的哲学著作,但都没有如此冲击我的思想,这句话引起了我对中国科研现状的思考。对于中国科技缺乏创新能力,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,觉得如此优秀的民族和灿烂的文化,怎么会缺乏创造力?我们已经和祖先隔绝得太久了,以至于连创新乏力的文化根源都找不到,却总是归因于现行制度。

中国社会文化心理(文化基因)来自于农业文明,形成于春秋战国到汉朝之间。我认为,世界只有两种类型的文明形式——以大陆为特征的农业文明和以海洋为特征的商业文明,前者的代表是产生于亚洲大陆的中华文明,后者的代表是产生于地中海沿岸的欧洲文明。农业文明存续的条件是稳定,包括气候、社会、人口等,因此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,一整套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被建立起来,这就是周礼。当生产力继续发展,原先基于氏族秩序和原始民主的制度不再适用,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小农业家庭社会逐渐形成,造成春秋战国的数百年分裂。在大分裂时代,原先的制度逐步崩溃,人们看到的是血腥的攻伐和争斗。如何在乱世中生存并且生活得幸福,是思想家们思考的事情。于是出现百家争鸣,最主要的思想流派是儒家、兵家—道家—法家、墨家,分别代表氏族贵族、官僚、小生产者3个阶级,而造成创新乏力的文化根源正是这几个思想流派之一——兵家—道家—法家。

兵、道、法虽各成一派,但三者思想脉络有着继承性。兵家思想主要来自于军事实践,主要特征是军事辩证法。道家继承了兵家的辩证法思维,将之发展成政治辩证法。法家以及后来以韩非为代表的道家则将这种政治辩证法推及生活。孙老韩这种军事—政治—生活的辩证法智慧和智力结构形式,符合儒家实用理性精神,因此被在汉朝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所吸收同化,并应用在政治以及生活中。

道家思想中的辩证法不同于西方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辩证法,它不去探究各种逻辑的可能性和概念,而是考察各种



本文作者 徐耀,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。研究方向:薄膜材料。图片为本文作者。

栏目主持人 关增建,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,特聘教授,上海市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、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。电子信箱:guanzz@sjtu.edu.cn。

现实的可能性和利益的实现,甚至明是非、辨真假、定对错也是次要的。所谓“真理”,依存于实际应用、人际关系、厉害目的等其他条件之中,而并不在其本身。道家认为,“难”并不在于道理难明、知识难得,而在于如何处理和运用知识,以及如何估计运用知识的实际后果。这种思想,有好的作用,但也束缚、限制和压抑想象力的展开,阻碍思维能力的开拓,所以创新乏力是必然的。恩格斯说,“在一切实际事务中,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”,言外之意是,在开拓创新上中国人较弱。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“拿来主义”和“猫论”都是道家思想的具体表现,其对科技创新的危害很深,从科研立项到科技组织,再到评价体系,处处体现着这种“文化传统”。

只注重知识的运用,不注重对真理的追求,这恰恰是中国在现代科学发展中错失先机的根源。反映在科技立项上,就是科研经费投入产出不成比例,原创的东西很难获得资助,跟踪性研究泛滥等。科研是智力活动,失去追求真理的目的,只能是拼凑知识。很多国家级大项目也是如此,甚至还有概念的拼凑,其目的是运用这些知识或概念来做一些“大”事情,这里的主要推动力是官员的功利思想,科研人员也会跟着推波助澜。往小里说,一个基金也是如此,申请书对研究方案的苛刻要求其实仅仅鼓励了对已有知识的运用,而忽视了基金的核心目的——探索。有位网

友列出基金评审人的14条意见,都是围绕研究方案,显得很琐碎。要知道,申请的创意才最重要,评审者要判断的是这个创意值不值得研究。至于如何研究,那是申请人的事情,评审人认为实现不了的事,也许对申请人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

只注重知识的运用,不注重对真理的追求,反映在研究生阶段之前的学习上,就是“填鸭式”的应试教育,运用知识的目的是考试,而根本不注重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,更谈不上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;反映在研究生学习中,就是只会做实验,不会思考,进而分辨不了什么是重要的研究,什么只是技巧。中国人一代代在这样的文化基因指导下成长起来,当然不会有太多创新能力。

文化基因难以根本改变,但也如同生物基因,可以局部调整。文化基因的改变,需要清醒地认识自身不足并且接纳外界刺激,而现在,我们对自身的认识还不足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经世致用”这个观念直到如今都在主宰知识分子的知识观,用学习获得的知识来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,没什么错,但不应该是全部。知识的另一个作用是探索真理,无论自然的还是社会的。经世致用再加上探索真理才是获得知识的全部目的。

中国哲学的本质是个人审美和处理社会关系。在传统农业社会里,一旦社会稳定、风调雨顺,人们就将目光投向诸如诗词歌赋式的享乐,为了享乐就需要获得财富和地位,因而个人必需首先集中精力处理人事问题,所以知识就不会被用在真理的探索上面。当今社会,人们学习各种知识仍旧是为了升学、赚钱、享乐,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下,几乎没有人去探索真理,所以知识仍旧处于“被运用以牟利”的状态,其原因固然有竞争压力,但根本上讲,还是中国的文化特点在起决定作用。

总之,我们如果一如古人般只注重知识的运用,不注重对真理的追求,中国的科技创新永远上不去,跟踪别人最多是做世界第二。

参考文献

[1] 李泽厚.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[M]. 北京: 三联书店, 2008: 76-96.

(责任编辑 王丽娜)